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 著

中国国民革命军 的北伐

——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Черепанов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в Китае

Изд. 2-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г.

(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翻译)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0³/₄ 印张 458 千字

1981 年 5 月第 1 版 198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000 册

统一书号: 11190·057 定价: 1.95 元

限国内发行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切列潘诺夫，苏联退休中将，曾作为苏联政府派遣的军事顾问于1923年来华，亲身参加了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回国。1938年再度来华任军事总顾问，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役。本书就是作者关于他在中国的这两个时期的回忆录。

本书的第一部分叙述了国民党改组的错综复杂的背景和尖锐激烈的斗争，对于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当时的活动有较详尽的记载。国民党一大后，作者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创建和教学工作，任总教官何应钦的顾问，以后他又一直作为何的顾问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和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斗争。作者对这些战斗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在第二部分，作者不仅讲述了北伐的一些重大战役，同时对北伐军内部的派系之争，围绕着迁都的斗争，宁汉分裂前后鲍罗廷的活动以及武汉政权的所作所为都有专门叙述。由于作者掌握的军事行动材料较多，书中对于某些战争场面的描绘是颇为精采的。如第一次东征的淡水之战、棉湖之战，第二次东征的惠州之战，北伐期间闽粤边界之战等等。书中还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两面派真面目。蒋介石在军事上碌碌无能，往往贻误战机，指挥失当，而且贪生怕死，畏敌如虎，可是在策划阴谋、玩弄权术方面却有着过人的本领。他在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后，“对

右派和‘左派’轮番进行打击，从而把越来越大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见本书第 393 页），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峰巅，发动了反革命叛乱。

本书附图三十二幅，均照原书译制。这些图有的是关于某一时期的形势图（如图 1），有的是很具体的作战地图（如图 12、13），对于说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各次战斗的进程是有帮助的，其中有些地图在今天难得的资料。

总之，由于作者亲身参与了某些战斗的组织与指挥工作，了解一些内情，在书中大量引用了他当时的札记、书信及其他文件，因此，本书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革命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可资参考的材料。对于研究中共党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中华民国史、近代军事史以及一般读者了解这段历史都会有所帮助。

六十年代，苏联出版了多种苏联顾问关于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回忆录，本书是其中篇幅较大、叙事较多的一本。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在回顾历史时，总是突出、夸大苏联顾问的作用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而对于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和对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应负的责任，则讳莫如深。可见这些回忆录的出版是有明显的政治宣传目的的。切列潘诺夫在这本回忆录中也过分宣扬了鲍罗廷的作用，尤其是对他 1927 年的活动，实际上加以全盘肯定，至于他对我国大革命的失败应负的责任，却只字不提。书中对于我党在这一时期的作用也评价很低。原书的序言对我国进行了攻击，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将它删去了。

研究一个时期的历史，需要掌握各方面的材料，进行对比、分析，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苏联顾问的回忆录，对于

了解我国革命的某段历史来说，就是一个方面——有时还是一个重要方面的材料。所以本书尽管存在着上述问题及其他不足之处，但只要我们心中有数，正确鉴别书中叙述的真伪，我们还是可以利用书中提供的比较丰富的历史资料的。

1964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作者的回忆录《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1924—1925）》（即本书第一部分），1968年又出版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6—1927）》（即本书第二部分）；1976年，作者把这两本书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合成一本，并且增补了《武汉会战的总结（1938—1939）》这一部分，将全书定名为《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译本系根据1976年第二版译出，考虑到本书主要是叙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因此译者将原书第二部分的题目作为本书名，将原书名作为副题。

由于作者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够，书中常有时间、地点、人名等方面的差错，译者对已经发现并查证确实的作了更正，不尽之处，望读者指正。

本书由曾宪权、李金秋、姚宝珠、罗峪华合译，陶文钊校订。在译校过程中得到多方面同志的热心帮助，谨此深表谢意，恕不一一提名。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有关的历史资料难以查找，本书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望读者不吝赐教。

1980.7

目 录

第一部分 在广东 (1924—1925)

革命的开端·····	3
到远方去·····	3
在北京·····	11
在广州·····	18
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31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58
黄埔军校·····	86
“纸老虎”的叛乱·····	119
广东的解放·····	137
第一次东征·····	137
出征之前·····	137
东征之初·····	155
进军淡水·····	169
进军汕头·····	183
纪念孙中山·····	195
东征结束·····	209
“联军”的叛变·····	221

一个阴谋·····	221
斗争的口号·····	230
暴风雨快来临了·····	239
粉碎叛乱·····	250
廖仲恺遇刺·····	256
第二次东征·····	263
出征之前·····	263
强攻惠州要塞·····	268
解放广东·····	289

第二部分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1926—1927)

回国为时尚早·····	301
用老布尔什维克的眼光进行观察·····	313
旧日军阀的习气·····	320
充当“商头”的角色·····	350
关于“三·二〇”事件的新资料·····	356
两次会见·····	376
蒋介石的权术·····	385

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399
敌军的营垒.....	403
对待我们的态度.....	411
加伦的战略思想.....	413
一个难忘的晚上.....	422
国民革命军插入湖北.....	438
闽粤边界的胜利.....	456
北伐第一阶段的国民革命军.....	465
主要同盟者的成与败.....	471
孙传芳的覆灭.....	477
冒着生命的危险.....	489
首都定在何处.....	491
蒋介石撕下假面具.....	500
蒋介石的假左派对手.....	507
国民革命军进军上海.....	510
从背后对革命的袭击.....	527
群众觉醒了.....	528
“暂时的”武汉派.....	535

帝国主义的豺狼嘴脸·····	539
蒋介石死死抓住领导权·····	542
叛乱相继发生·····	544
粉碎“安国军”·····	546
“左派”步蒋介石的后尘·····	550
一切可能性都加以利用了吗·····	554
军人领袖的道路·····	567
坚守岗位直至最后·····	574

第三部分 武汉会战的总结（1938—1939）

再度奔赴遥远的地方·····	587
军队的概况·····	593
游击运动的状况·····	608
武汉防御战与长沙附近之战·····	613
若干结论·····	625

译名对照表·····	635
------------	-----

第一部分

在广东 (1924—1925)

革命的开端

到远方去

1923年春天我特别紧张。我既要结束总参谋部学院（现名伏龙芝学院）初级班的课程，同时又要准备转入该学院东方系高级班的学业。

在最艰难的斗争中捍卫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人农民都是贪婪地渴望学习的。我的许多出身于民众底层的同志都同时在两所高等学校里学习，例如同时在军事学院的初级班和农业学院里学习。同一人除了军事学院之外甚至还能够念完医学院的课程。这种非常好的风气也感染了我：我同时在军事学院的初级班和该院的东方系学习……

为什么恰恰是东方系吸引了我呢？

原来，早在童年时代，远东一些急风暴雨般的事件较之别的东西更加激动我的心灵。最初是1900年中国人民的起义，然后是日俄战争。记得我那时找了些以这些事件为题材的附有插图的通俗读物，津津有味地仔细阅读。好些年之后，生活使我与朝气蓬勃的远东代表们有了接触。在国内战争的前线我恰好同中国同志们共同作战，于是我对中国的兴趣又以新的力量重新恢复了。

1918年3月或4月，当我在加特奇纳担任红军第二团团长的時候，一位年轻的中国人来找我们请求接收他当志愿

兵。随后他又领来了一些中国人，我们也把他们收下了。此后他们几十人几十人地投奔而来。我向师长报告了这件事。根据师长的命令编成了一个中国士兵连来守卫某些设施。

在我于1918年底至1919年初任参谋长的旅里也有一支中国志愿军支队。在从德国侵略者和白匪手中解放波罗的海沿岸的战斗中我们曾与他们同甘共苦。

我产生了学习汉语的愿望。我在入东方系时，未曾考虑过将来什么时候会献身于外交工作。我的幻想还没有那么远。如同在青年时代一样，我只不过想在远东工作而已。

在分配三年级学员军职的委员会里，人们多次劝我放弃在东方系的学习，去指挥一个师。委员会的一位委员、我的一个朋友、原先的同事和同班同学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扎宾特别坚决地要我同意。他说：“军队需要指挥官”。扎宾也未料到，正是他本人不久将要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挑选一批军事顾问。

我们正在准备进行毕业考试和毕业论文的答辩。不知怎地学员们得知了驻华武官、我们学院的前任院长阿纳托里·伊里奇·格克尔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的消息。大家都说他要来挑选一些学员到中国去工作。有一天，院长秘书对我说道：“阿纳托里·伊里奇找您。”我听成了“阿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我是喜欢听他讲课的。于是我惊讶地问：“是卢纳恰尔斯基同志吗？”

秘书解释说：“不！是格克尔，阿纳托里·伊里奇。”他又补充说：“他已经在委员的办公室里等您了。”

我压根儿想不出来，前任院长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以前总见格克尔穿着军装。但他现在穿着便服，因此乍一见我没有认出他来。便服使他具有那种我想象中的

“典型的”外交家的风度。

阿纳托里·伊里奇亲切地向我打招呼，并用手势示意让我坐下。他一边仔细瞧着我，一边提出一些一般性的调查问题：社会出身、最高职务和在旧军队里的官衔、加入红军的时间、参加国内战争的情况、党籍。

我答道：

“出身农民，在结束旧军队的服役时任上尉连长。1918年初在前线志愿加入红军；从德国人进攻的第一天起，即1918年2月18日我就开始参加国内战争了，1920年秋的波兰战役是我参加的最后一仗；在前线当过一年半团长，有一年多任旅参谋长和旅长；预备党员。”

“您是行伍出身的军官？”

“是的。”

“我比您年龄大些，科班出身，我结束在旧军队的服役时任中校。”

格克尔向在场的学院委员穆克列维奇看了一眼，说：

“您对切列潘诺夫同志有什么问题吗？”

穆克列维奇回答说：“没有，我从1918年秋就认识切列潘诺夫同志。在准备进攻普斯科夫期间，他是旅参谋长。在学院里他也是一个守纪律、有才干的指挥员。我已经对您说过，我赞成切列潘诺夫同志为候选人。”

他们要我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阿纳托里·伊里奇那儿去一趟，就让我走了。

次日早晨，我的同班同学亚科夫·格尔曼、巴维尔·斯莫连采夫以及本来已经毕业、但仍在学院东方系学习的尼古拉·捷列沙托夫和弗拉基米尔·波里亚克都聚集在旅馆中格克尔的房间里。

格克尔把我们领到工农红军司令部去见别尔津（在国内战争中我曾见过他），因而也就决定了我的命运。当我们知道孙中山要求苏维埃政府给他派去一批政治和军事顾问时，我们五人全都同意到远方去当志愿兵。

我们援助伟大的中国革命家的主张，这不容争辩是列宁的思想。我们记得，正是列宁注意到了孙中山，并对其活动的意义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欧洲文明世界是在1911年，即辛亥革命那一年知道孙中山的。而在此以前，为中国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们的领袖的名字几乎未曾见诸西方报刊。然而列宁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无产阶级、世界上一切真诚的国际主义者注意孙中山活动的意义，并且让人们关切地注视他正在进行的活动。早在斯托雷平之流把党打入地下、许多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被迫侨居国外的那些岁月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民主革命在未来结成联盟的思想。当我国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一思想就开始得到了具体体现。

苏联同志们处于从组织上体现这一联盟的发源地，他们是遵照列宁的指示行动的。我指的是契杰林、加拉罕、越飞、鲍罗廷等同志。而在孙中山方面，他在那些岁月中也逐步了解了俄国革命对于中国解放的意义。在分析这一过程的大量著作中首先要推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齐赫文斯基的作品。我只想强调指出，孙中山独自主动地转向学习我国经验，这是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和互助具有深刻的天然性和生命攸关的必要性的最光辉的历史见证之一。

历史事件的整个客观进程权威性地要求有这样一个联盟。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工农红军的年轻指挥员、这些参加

第一个五人小组被派往中国的顾问来说，党和政府委托给我们的任务尽管很不寻常，却是十分自然的。

确实，同武装干涉者和白匪的浴血战斗是在两年前刚刚结束的。国家还远未从创伤、饥荒和严寒中恢复元气，可是我们却要万里迢迢地到我们完全陌生的异乡广州去，不惜生命地为中国的革命任务服务。我们对此没有丝毫怀疑，大家都认为应当这样。列宁的思想和在争取苏维埃政权斗争中各民族友好团结的典范使我们成了坚定不移的国际主义者。

孙中山的名字和事业已为我们所熟悉。这不是由于我们出发前所得到的那项指示。而只是由于苏联舆论界和报界在那些日子里关切地注视着中国的解放斗争。党从我们的报刊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使它具有了广泛的国际主义性质，生活不断证明这一政策是英明的。

就这样，我们没有踌躇，上路吧！

在莫斯科，在沃兹维任克（现名加里宁大街），我们五个青年人身着军装顺便到了百货商店。我们走进成衣部，在柜台前拿不定主意。

我们当中年岁最大的数尼古拉·捷列沙托夫，他高个子，宽肩膀，有一张愉快的圆脸庞。他看了一下衣服说道：

“这可是个难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得穿这种讨厌的‘犹太人穿的长襟衣服’。我真不明白怎么买它。萨沙，‘你也许能帮个忙吧！’”他转向我说。

“你可真会找顾问！尼古拉，我这辈子不仅没有穿过这种衣服，连西装上衣也没穿过。让亚沙帮个忙吧，他在服兵役前当过办事员。他准穿过这种莫名其妙的服装。”

又高又瘦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爱沙尼亚人格尔曼回答说：“我穿过，但时间不久。”他盯着天花板，好象那里写